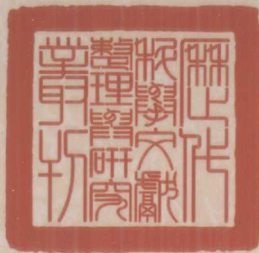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主编 陈文新

《游艺塾文规》正续编



【明】袁 黄 撰

黄强 徐姗姗 校订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主编 陈文新

《游艺塾文规》正续编

【明】袁黄撰

黄强 徐姗姗 校订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明]袁黄撰;黄强,徐姗姗校订.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9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陈文新主编

ISBN 978-7-307-06660-1

I. 游… II. ①袁… ②黄… ③徐… III. 科举考试—中国—明代—史料 IV. D69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7239 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3.75 字数:735千字 插页:4

版次: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6660-1/D·852 定价:22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傅璇琮

主 编 陈文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海峰 刘爱松 陈文新 陈水云

张思齐 罗积勇 周 群 赵伯陶

陶佳珞 黄 强 詹杭伦 霍有明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总序

陈文新

(一)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19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①。

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官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古往今来科举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②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页。

②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36页。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余秋雨曾说：“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①丰富的常识、健全的理解力和良好的涵养是文官选拔的三个必要条件，而科举考试以经学、诗文、策问为主体部分，已足以满足文官选拔的基本要求。《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到一位擅长八股文的才女——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她的那份功课单颇值得留意。“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她做‘破题’、‘承题’、‘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小姐的这份功课单，明清时代的读书人见了，一定不会有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正是打这条路上走过来的。鲁编修曾感慨说：“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这提示我们，鲁小姐大体可以代表明清时代的进士水准。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鲁小姐不一定是优秀的学者（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学者），鲁小姐也不一定是文学天才（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文学天才），但她的文化素养之高是不容置疑的（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是挑选文化素养较高、具有健全的理解能力和丰富常识的官员）。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虽然明清时代进士的总量不大，即使加上举人和生员，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但是，鲁小姐这份功课单的使用人数却远大于进士、举人和生员的总和，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由此得到了提高。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附带指出：就明清时代的教育体制而言，国家的投资是很小的，其主体部分已分解到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国家主要管考，用考试的办法促使国人学习知识，并没有花多少经费在办学上。以较少的国家投入而能达到激励国民普遍向学的效应，科举考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其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胡适所说的公平，包括三种含义：一是公开考选，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到各地的文化水准，录取的人员，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而是遍及全国。三是实行回避制度，“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有时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这种公

^① 余秋雨：《十万进士》，《收获》1994年第4期。

道的办法，大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抵制。所以政府不用靠兵力和其他工具来统治地方，这是考试制度影响的结果”^①。这些话出于胡适之口，足以说明，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只要具有清明的理性，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2005年，任继愈曾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一文中提出设立“国家博士”学位的设想。其立论前提是：我国目前由各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缺少权威性和公正性。之所以不够权威和公正，不外下述几个原因。其一，“各校有自己的土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取得学位后，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都是同等的”，这当然不公平。其二，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第二年大部分时间忙于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发论文，第三年忙于找工作，这样的情形，怎么可能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博士？其三，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派秘书代他上课，甚至不上课而拿文凭，这样的博士能说是名副其实的吗？只有设立“国家博士”学位，采用统一标准选拔人才，这样的“博士学位”才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而国家在高级人才的选拔方面统一把关，不仅可以避免“跑”博士点和博士生扩招带来的许多弊病，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而且，由于只管考而不必太多地管教，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任继愈的这篇文章现已收入《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有心的读者不妨一阅。

与任继愈的呼吁相得益彰，早在1951年，钱穆就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针对民国年间（1911—1949年）人事管理腐败混乱的状况，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思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数。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②。钱穆的意思是明确的：参考借鉴科举制度，有助于人事管理的规范化和公正性。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③现代中国的人事管理理应借鉴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何借鉴，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②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4～115页。

③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以其“程序的公正”为国家选拔了大量行政官员，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方面，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这是其显而易见的功能；它还有其他不那么显著却同样值得重视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和人文教育功能：科举制度以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将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们试就此略作讨论。

明清时代有一项重要规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这一规定是耐人寻味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要读物。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秦汉以降，“中国的脊梁”大多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为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

文天祥是宝祐四年的状元。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它表明：进士阶层在实践儒家的人格理想方面，其自觉性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宋代如此，明代如此，甚至连元代也是如此。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论及“元末殉难者多进士”这一现象：“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①接下来，赵翼列举了余阙、泰不华、李齐、李黼、王士元、赵琬、周鏊、聂炳元、刘耕孙、丑闾、彭庭坚、普颜不花、月鲁不花、迈里古思等死难进士，最后归结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②在元末殉难的进士中，余阙（1303—1358年）是最早战死的封疆大臣。他的朋友蒋良，一次和他谈起国难，余阙推心置腹地说：“余荷国恩，以进士及第，历省居馆阁，每愧无报。今国家多难，授予兵戎重寄，岂余所堪。然古人有言：‘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万一不幸，吾知尽吾忠而已。”余阙殉难后，蒋良作《余忠宣公死节记》，开篇即强调说：“有元设科取士，中外文武著功社稷之臣历历可纪。至正辛卯，

① 赵翼：《元末殉难者多进士》，《廿二史札记》卷30。

②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6页。

兵起淮、颍，城邑尽废，江、汉之间能捍御大郡、全尽名节者，守豫帅余公廷心一人而已。”^① 在余阙“擢高科”的履历与他忠勇殉节的人格境界之间，人们确认有其内在联系。无独有偶，《元史·泰不华传》在记叙元末另一著名的死节之臣泰不华（1305—1352年）时，也着重指出：其人生信念的基本依据是他作为“书生”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在与方国珍决战前夕，泰不华曾对部从说过一番词气慷慨的话：“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徕，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书生”“所学”与捐躯“报国”之间关系如此密切，足见以《四书》、《五经》作为基本考试教材的科举制度，在维持世道人心方面的作用的确是巨大而深远的。

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功能不仅泽及宋元，泽及明清，甚至泽及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的现代。其实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原因在于，不少现代名流的少年时光是在科举时代度过的，他们系统地受过这种教育，耳濡目染，其人生观在早年即已确立并足以支配一生。儒家经典的生命力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余泽亦由此可见。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并有意多引他的言论。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世人眼中的胡适，只是一个文化激进主义者，以高倡“打倒孔家店”著称。人们很少注意到，胡适在表面上高呼“打倒孔家店”，但在内心里仍对孔子和儒家保留了足够的敬意，是儒家人生哲学的虔诚信奉者和实行者。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有胡适的如下自白：“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理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在这场伟大的‘新儒学’（理学）的运动里，对那（道德、知识；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两股思潮，最好的表达，便是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后世学者都认为‘理学’的真谛，此一语足以道破。”同一章还有唐德刚的一段插话：“‘要提高你的道德标准，你一定要在‘敬’字上下功夫；要学识上有长进，你一定要扩展你的知识到最大极限。’适之先生对这两句话最为服膺，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一次我替他照相，要他在录音机边作说话状，他说的便是这两句。所以胡适之先生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他反对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都是从‘理学’这条道理上出发的。他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的，在笔者看来，都是些表面账。吾人如用胡先生自己的学术分期来说，则胡适之便是他自己所说的‘现代期’的最后一人。”^② 胡适是在少年时代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在经历了废止科举、“打倒孔家店”等种种变故后，儒家的人生哲学仍能贯彻其生命的始终，由此不难想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科举时代，儒家经典对社会精神风貌的塑造可以发挥多么强大的功

① 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8页。

② 胡适：《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433页。

能。虽然生活中确有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两歧的情形，但正面的成效仍是不容忽视的。

“精神文明”是中国人常用的一个概念。“精神文明”是相对物质文明而言的，就个人而言，需要长期的修养，就民族而言，需要长期的培育。中国古人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所以常常强调“潜移默化”，经由耳濡目染的长期熏陶，价值内化，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如果这种道德规范大体近于人情，既“止乎礼义”而又“发乎性情”，它对社会的稳定，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化的功能。目前教育界所说的“深厚的人文知识素养，有助于塑造高尚的精神世界，提高健康的审美能力”，与这个意思是相通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时代的基本读物，人文教育功能是其不容抹杀的价值，并因制度的保障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被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①罗兹曼的意见也许是对的。而我想要补充的问题是：在科举制废止之后，如何才能保证《四书》、《五经》的人文教育功能得以继续发挥？

(三)

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它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这是我们编纂出版《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初衷，也是我们不辞劳苦从事这一学术工作的动力。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重点包括下述内容：

1. 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

唐代杜佑《通典》中特设“选举”类。从《新唐书》开始，历代正史多有《选举志》。历代《会要》、《实录》、《纪事本末》等史传、政书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科举制度沿革的资料。还有黄佐《翰林记》、陆深《科场条贯》、张朝瑞《明贡举考》、冯梦祯《历代贡举志》、董其昌《学科考略》、陶福履《常谈》、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等一批专书。历代《登科录》和杂录类书籍，也保存了大量关于科举的材料。唐

^①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635页。

代登科记多已散亡佚，有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可供参考。宋代以后的登科记保存较多，明清有关材料更为繁富。

2. 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

八股文是最引人注目的考试文体。八股文集有选本、稿本之分。重要的选本，明代有艾南英编《明文定》、《明文待》，杨廷枢编《同文录》，马士奇《澹宁居文集》，黎淳编《国朝试录》等；清朝有纪昀《房行书精华》，王步青编《八法集》；还有《百二十名家集》，选文3000篇，以明代为主；《钦定四书文》，明文4集，选文480篇，清文1集，选文290篇。稿本为个人文集。明清著名的八股大家，如明代的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清代的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方苞、王步青、袁枚、翁方纲等人，均有稿本传世。相关著述数量也不少。清梁章钜《制义丛话》等，是研究八股文的重要论著。其他考试文体，如试策、试律等，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这些科举文献，一般读者不易见到，或只能零零星星地见到一些，或虽然见到了也难以读懂，亟待系统地整理出版，以供研究和阅读。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出版预计需要8年左右的时间。前4年（2006—2009年）用来整理出版与科举相关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后4年（2010—2013年）内陆续推出10本以上的研究性著作。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批书目包括以下数种：《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也许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曾有断代或内容单一的科举文献陆续问世，如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出版了《明代登科录汇编》66种（未经整理），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一大套精装本《清代朱卷集成》（未经整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由杨学为主编的7册10卷近千万字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未经整理），龚延明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录》也在编纂之中。所有这些都极有价值，但它们所涉及的只是某一类别，或限于登科录，或限于朱卷，或限于考试，尚不具备综合性的品格。我们这套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之需。而在整理、研究方面投入的心力之多，更是有目共睹。我们的目的是为推进学术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是一项规模宏大、任务艰巨、意义深远的大型出版文化工程。编纂任务主要由武汉大学专家承担，并根据需要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或科研院所聘请了若干学者。参与这一工程的各位专家

不辞辛苦，努力工作，保证了编纂进度和质量；武汉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2008 年 12 月 28 日

于武汉大学

校订前言

——《游艺塾文规》正续编述略

黄 强

《游艺塾文规》（以下简称《文规》）和《游艺塾续文规》（以下简称《续文规》，与《文规》合称时称《文规》正续编）是明代嘉靖、万历间人袁黄编撰的两部举业用书，故《文规》又名《举业定衡》。袁黄，浙江嘉善人，明隆庆四年庚午科举人，万历十四年丙戌科进士，曾任河北宝坻知县，颇有善政，万历二十年擢升兵部职方司主事，在朝廷发兵助朝鲜抗击倭寇时参赞军机，后因与主事者不合而遭诬陷弹劾，罢职家居，闭户著书。天启改元追叙东征功，得赠尚宝司少卿。《文规》正续编成于其晚年罢职家居时，书的内容如《文规》前《小启》所云：“将新科墨卷自破而承而小讲、大讲分类评订，如何而元，如何而魁，如何而中式，一览了然。”此二书本系袁黄为“杜门教子”而编撰，但袁氏是为当时人所熟知的八股文选家，此前编撰的《谈文录》、《举业彙率》、《心鹄》等书广为流布，此二书一旦编成，自不可能仅为家门独得之秘，在科举时代，其实用价值使之很快刊布海内，成为企盼中式的士人的必读教材。

同一部文献，刊布的当时与保存于后世的价值会有不同，而类似于《文规》正续编这样的科举文献，在不同的时空中的价值更是相去悬殊。在科举时代，无数士人看重它们的主要是应试的实用价值，当八股取士制度造成的后果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当时间的潮水将明清两代众多的八股文选本、评本冲刷殆尽之后，物以稀为贵，偶然保存下来的少量选本、评本便成了研究科举史、文化史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清代去今不远，八股文选本、评本尚多，而明代则不多见，至于像《文规》正续编这样，在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宏阔视野中，全面系统、连续不断地剖析二十五年中的八科乡试墨卷、九科会试墨卷，囊括嘉靖、万历间三十六家论文精要（也涉及古文），带有八股文研究性质的明代大型评本，管窥所及，尚未见第二部，其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

《游艺塾文规》正续编现存版本考述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游艺塾文规》（清华本）共十卷六册，本书的标点即以之为底本。书高 268 毫米，宽 164 毫米，版框高 232 毫米，宽 258 毫米，《续修四库全书》据以影印。扉页竖排双行行书题书名云“新刻袁了凡先生游艺塾文规”，每行 6 字，上横排楷书 4 字云“举业定衡”，左竖排三行小字云：“了凡先生旧有《谈文录》、《举业彀率》及《心鹄》等书刊布海内，久为艺林所传诵，近杜门教子，复将新科墨卷自破而承而小讲、大讲分类评订，如何而元，如何而魁，如何而中式，一览了然。凡前所评过者，一字不载。买者须认叶仰山原板。”第一、第二行 30 字，第三行 29 字。后有《游艺塾文规引》，末署“赵田逸农袁黄坤仪甫书”。无目录，卷一首行顶格署“游艺塾文规卷之一”，以下各卷类推。各卷第二行至第五行下方由右向左依次署“赵田逸农了凡袁黄坤仪甫著，男袁天启若思，侄孙袁士鲲南之，侄孙袁祚熙载之甫同校，书林叶氏仰山绣梓”，独第三卷缺此题署。版式为半叶十行，著者的叙述和评论一般用大字，行 25 字，引用原文一般用小字，在原单行中分列两行，行 25 字。四周单边，白口，版心镌“举业定衡”四字，单黑鱼尾。书中有三处硃笔对原来误字的改动，不明何人所改。全书末叶下半叶有花叶图案，其中有双行题款云“万历壬寅孟冬月双峰堂余文台梓”，每行 7 字。据此可知此书刻成于万历三十年壬寅孟冬月，是叶仰山原板的覆刻本。此书始作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虽说除首卷外，以后各卷只是袁黄将新科墨卷自破而承而小讲、大讲分类评订，耗时无多，但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编著而成，而且先后有叶仰山原板和余文台覆刻，不能不使人惊诧其时举业类用书的问世速度之快。时至今日，叶仰山原本已不复可见，此本除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一部外，国家图书馆以及安徽省博物馆各藏一部，国家图书馆的一部仅存前五卷，书中有两处文字缺漏，阅者以硃笔添加共 3 字。安徽省博物馆的一部缺扉页，但清华本有三处 4 字漫漶，可据此部校补。书中袁黄谓其子云：“今自辛丑溯至庚辰，录其佳者与汝一阅，恨简帙散失，遗漏颇多，然记此亦足以窥墨义之藩篱矣。”则《文规》所评乃万历八年庚辰至万历二十九年辛丑这二十二年间袁黄认为值得一提的乡会试墨卷。

国家图书馆藏《游艺塾续文规》（国图本）共十八卷十册，本书的标点即以之为底本。书高 251 毫米，宽 155 毫米，版框高 213 毫米，宽 248 毫米，《续修四库全书》据以影印。扉页不存，有《游艺塾续文规引》，文字大部分残缺，末句云：“故愚以为老师此言，乃今日取士之指南，百世语文之标准也。因述其言以为引。”署“赐进士出身前奉敕赞理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军务兼督朝鲜兵政加四品服兵部职方司主事袁黄撰”。有目录。卷一首行顶格署“游艺塾续文规卷之一”，以下各卷类推。各卷第二行至第五行下方由右向左依次署“赵田逸农袁黄坤仪甫辑，门人刘有执无竞甫阅，男袁天启若思甫订，嗣男叶绍袁仲韶、侄孙袁祚熙载之甫同校”。版式为半叶九行。著者的

叙述和评论一般用大字，行 20 字，引用原文一般用小字，在原单行中分列两行，行 20 字。四周双边，黑口，版心上方镌“续文规”三字，单黑鱼尾。卷九缺第二十四叶，卷十二缺第二十三叶，却拉来卷九的第二十三叶充数，卷十三文末断断续续共缺 30 多字，第十八卷末残缺数叶。因扉页不存和末尾残缺，故不像《文规》那样可知确切的版本信息。此本安徽省图书馆藏有一部残本，扉页不存，目录仅存前三叶，缺卷九以后目录两叶，正文仅存前九卷，分为两册（估计因正文仅剩前九卷，故书贾去掉了卷九以后目录），但国图本卷九所缺第二十四叶和前九卷中有二十处共 29 字漫漶或缺漏，可据之补全。日本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藏有一部全本。酒井忠夫的《袁了凡的生平及著作》一文（以下简称“《袁》文”）为此书所作的叙录云：“十八卷，十八册，明刊，内阁文库藏。”^①细核此本，版式为半叶九行，行 20 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版心上方镌“续癸甲文规”五字，各卷前题署与国图本相同，但除册数与国图本不同以外，分卷也有所不同，特别是题为“了凡袁先生论文”的卷三、卷四和卷五开头结尾的文字以及中间不少内容均不同于国图本和安图本，其他各卷中的分段亦小有不同，字数多寡略有差异，故知其与国图本并非同一版本。此本不仅扉页不存，也没有国图本所有的《游艺塾续文规引》和目录，但此本较为精善，缺漏错误之处很少，而国内版本则漫漶缺漏之处甚多，如此本在后，不可能将国内版本这些漫漶缺漏的文字复原，由此可证此本在前，上述国图本卷十以后各卷中的残缺部分皆可据以补足。鉴于内阁文库本卷三、卷四和卷五开头结尾的文字以及中间不少内容均不同于底本，我们在校订中特地将此三卷作为附录置于第十八卷之后，以便于研究者与底本对照。酒井忠夫已经意识到在《续文规》之前应该有《文规》，他在叙录中云：“在本书之前按理应该有辑录旧日‘文规’的书。”

《续文规》前九卷为三十六家论文，其中卷三、卷四、卷五均为“了凡袁先生论文”，第十卷开始才是对乡会试墨卷的评析，目录为“癸甲：破题”，第十一卷目录为“癸甲：承题”，第十二卷目录为“癸甲：小讲”。“癸甲”所指为何？内阁文库本为何称“续癸甲文规”？细考文中提及的中式者的科名，可知是指万历三十一年癸卯科乡试和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会试，“癸甲”乃癸卯与甲辰的天干合称，此种合称不多见，不妨各举三例以释其疑。

先看万历三十一年癸卯科乡试例：

1. “今年主司要以‘读书’为学……独孙克振不以‘读书’为学，亦能中式。”（卷十四）《江南通志》卷一百二十九《选举志·举人五》万历三十一年癸卯科出孙克振，云“滁州人”。

2. “浙江‘樊迟问仁’全，陈万言此作精莹雅炼，自足冠场。”（卷十五）《浙江通志》卷一百四十《选举十八·明举人》万历三十一年癸卯科出陈万言，云：

① [日] 酒井忠夫：《袁了凡的生平及著作》，尹建华译，《宗教学研究》1999 年第 2 期。

“秀水人，己未进士。”

3. “福建‘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解元林欲樾通篇皆雅炼不群。”（卷十六）

《福建通志》卷三十八《选举六·明举人》万历三十一年癸卯林欲樾榜出林欲樾，云：“泉州府，欲栋弟，第一名，丁未进士。”

再看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会试例：

1. “今年首篇承题都是一直说下，惟余懋孳承云……王家彦承云……此二承略有古法存。”（卷十一）《江南通志》卷一百二十三《选举志·进士五》万历甲辰科杨守勤榜出王家彦，云“吴江人”；出余懋孳，云“婺源人”。

2. “二名鲁史作三段……闻今年场中主司亦以三股平讲为善。”（卷十三）《浙江通志》卷一百三十三《选举十一·明进士》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杨守勤榜出鲁史，云：“余姚人，副使。”

3. “‘不知命’全，会元杨守勤既重‘命’字，全篇脉络，自当一气贯通……余往年评浙江乡卷，原许其可以作元，今年春榜初传，自信予言之不谬。”（卷十三）《浙江通志》卷一百三十三《选举十一·明进士》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杨守勤榜首出其名，云：“慈溪人，状元，右庶子。”

此六例毫无疑问地表明目录中的“癸甲”是合称万历三十一年癸卯科和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尤其是第一例和后三例中的“今年”，更是特指袁黄撰写此卷时的年份。由此可见，《续文规》紧随《文规》之后评析新科墨卷，中间没有间隔。酒井忠夫或未顾及内阁文库本《续文规》版心上方所镌“续癸甲文规”五字，或未细考其义，只是因《续文规》中收入了袁黄本人的《读书作文法十七条》等文章，而这些文章又见于由武之望等人编辑的刊刻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的《举业卮言》卷四之中，而误以为《续文规》“出版于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袁黄被革职之时”。

《续文规》由袁黄本人“甫辑”，第十卷至第十八卷为其评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行文中袁黄经常联系自己，如卷十三评万历三十二年甲辰会试墨卷，其中有云：“往年予作‘故君子尊德性’一节文字，只依经文，浑融合讲，并不分配，今年诸作则脱尽支离之习矣。卧病林皋，睹之不觉大快。”说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袁黄编撰《续文规》时正“卧病林皋”。但《续文规》成书过程不同于《文规》，由两个迹象可以确定这一点：其一，早在万历二十一年，袁黄就被革去兵部职方司主事之职，后归乡家居，写于万历二十九年的《文规》小引后尚且自署“赵田逸农”而不署官职名，又岂会在写得更晚的《续文规》小引后自署“赐进士出身前奉敕赞理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军务兼督朝鲜兵政加四品服兵部职方司主事袁黄撰”？其二，书中卷三、卷四、卷五均为“了凡袁先生论文”，亦大不类袁黄本人口吻。出现这两个例外，唯一的可能性是《续文规》最终是由袁黄的弟子整理编辑成书的，小引虽然是袁黄本人所写，但弟子们改署

其进士出身及最终官职，确定卷三、卷四和卷五的目录时也执弟子礼而尊称“了凡袁先生”，各卷前“门人刘有执无竞甫阅”之署透露了个中消息。在袁黄的著述中，像《续文规》这样由其弟子后来将其所辑文稿整理编辑成书者并非个别。如《宝坻政书》乃“门生刘邦漠、王好善编辑”，卷首邳赞序云：“公去之日，士民已刻《德政录》矣。乃刘王二君以不尽公之迹也，收辑《宝坻政书》十二卷……但取公文移示谕之见诸实事者，次第编之。”^①《四书删正》、《书经删正》的情况更为特殊。《续文规》卷三《了凡袁先生论文·与邓长洲》云：“嘉靖乙卯年刻行，五十年来遍传天下。当时并不书弟之名……近有友人改作《删正》，而列弟名于上。”初刻时袁黄年仅二十三岁，并未署名，几十年后覆刻，友人改换书名，再署上袁黄之名。明乎此，《续文规》的成书过程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游艺塾文规》正续编的编撰者袁黄考辨

《文规》正续编的编撰者袁黄，曾因其劝善思想和慈善信仰而在明万历以后名噪一时，其书写的《功过格》和他人综合的以其《立命之学》为核心的《了凡四训》大行其道，在世俗民众和下层读书人中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因其杂著中表现的慈善思想、养生观念、人生体验和感悟，适合时下社会生活的需求，已经成为互联网上的热门人物，甚至有撮合其事迹拍成电视剧者。国内的社会学研究者认为袁黄“是迄今所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名的善书作者”，“袁黄的思想不仅对有清一代善书的编撰、流传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明末以后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起到了指导作用”^②。日本多位研究中国古代善书的学者确认“在善书发展上建立了功绩的袁了凡的东西很多”^③。

然而，从更深广的层面看，仅仅将袁黄视为一位善书作者、慈善思想的先驱人物或八股文选家，尚不足以尽其底蕴。明末清初多有将袁黄与李贽相提并论者。如张履祥《告先师文》云：“本朝至隆万以后，阳明之学滋敝而人心陷溺极矣。卑者冥冥于富贵利达，既惟流俗之归，而其高者率蛊于李贽、袁黄猖狂无忌之说，学术于是乎大裂。”^④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竟并列“李贽袁黄”小传，称袁黄“有史论及‘四书’，极诋程朱，至尽窜注解，更以己意。坐非儒见黜，焚其书”。在他们眼里，袁黄与李贽一样，是挑衅儒门的异端。今日看来，尽管李袁二人异端的程度和内涵不同，但确有其相通之处。李贽犯事之后，袁黄颇有不平之意，其《与吴曲罗书》云：“近闻李卓吾已罹法网，未审果否。夫削发而拖朱，诚非中道，然世之缙绅干名犯义、殃民败俗者何

①（明）邳赞：《刻〈宝坻政书〉序》，《了凡杂著·宝坻政书》卷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0册，第546页。

② 王卫平、马丽：《袁黄劝善思想与明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安徽史学》2006年第3期。

③ [日] 酒井忠夫：《袁了凡的生平及著作》，尹建华译，《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2期。

④（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二，同治十年刻重订本。